

# 适应性调适：联合党建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机制

李慧宇，陈军亚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基于国家与社会互构的逻辑，引入“政党适应理论”构建联合党建推进产业振兴的适应性调适分析框架，对湖北省麻城市Y镇“片区联合党委”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模式进行考察，研究发现：“适应性调适”蕴含组织再造、功能重组和环境适应三个基本要素，这些要素通过跨边界的组织创新、过程-目标导向的资源整合以及问题-绩效导向的情景关联，促进了党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与产业发展效能的有机结合。未来，要进一步增强产业发展与党组织引领的契合程度，通过完善产业发展的结构和过程，在优化产业发展结构和调适产业发展过程中破解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不利因素。

**关键词：**党建引领；产业振兴；政党适应性；调适

中图分类号：F327；D26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25)06-0092-09

## Adaptive adjustment: A study on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of joint party build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LI Huiyu, CHEN Junya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ogic of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arty adaptation theory” to construct an adaptiv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joint party building to promote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investigates the mode of “district joint party committee”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Y Town, Macheng City, Hubei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adaptive adaptation” contains three basic elements: organizational reengineering, functional re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which are related through cross-border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rocess-goal oriented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problem-performance oriented scenario.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nhance the degree of agreement betwe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nd to solve the unfavorable factors restricting industrial scale development by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party building leading;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party adaptability; adjustment

## 一、问题的提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物质基础和支撑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党的

收稿日期：2025-07-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22VRC125）

作者简介：李慧宇（1997—），女，山西朔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与基层治理。

组织优势和治理优势是带领产业振兴的重要动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产业振兴不再局限于单个村庄的发展，而是要求规模化、区域化的合作式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将党建引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的效能优势，是新时代以党建引领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议题。

针对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强调通过整合资源，实现产业要素的流动与分配。产业发展关键在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效能的最大化，整合产业资源和土地资源能

够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基于此，有学者提出通过村社主导资源整合<sup>[1]</sup>、地权整合<sup>[2]</sup>等整合路径夯实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二是强调发挥数字治理和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助推作用。数字平台通过形塑多轨道、制度化的机制，在国家与社会“双向增权”的力量下赋能乡村产业振兴<sup>[3]</sup>，而数字化农业信息以及数字基础设施能够赋予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sup>[4]</sup>。三是强调多元主体的互动，提出发挥党组织、政府和市场的能动性。在政府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其核心挑战在于实现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任务与分散农户的有效衔接，这就需要引入多主体的力量。一方面，要发挥驻村书记、企业、乡贤和供销社<sup>[5]</sup>等主体的作用，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从外源驱动向内生驱动转变<sup>[6]</sup>。同时，通过完善产业发展的合作机制，以政企合作<sup>[7]</sup>、万企帮万村<sup>[8]</sup>等方式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另一方面，党的组织力<sup>[9]</sup>以党建引领为基础、以农业组织化实践为依托，通过构建互构式“惠农共同体”<sup>[10]</sup>规避产业发展陷入“失败—扶持—再失败”的怪圈<sup>[11]</sup>。党组织的跨域能力使得基层党组织能够凭借跨村联建<sup>[12]</sup>、跨界发展网络的构建<sup>[13]</sup>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既有研究从外生动力推动和内源能力激发两个方面阐述了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同时也关注到了党组织在产业发展中的跨域组织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但从产业发展的实践逻辑来看，其最终目标是通过打破区域限制和资源限制实现规模效应和经济增长，这其中涉及多个主体的协调和适应性问题。由此可见，当前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较少探讨在科层体制和条块结构清晰的背景下，产业发展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形成发展优异的深层机制；二是已有研究较少从党组织适应产业结构、融入产业发展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党建引领如何推动产业发展。从实践来看，乡村产业振兴仍面临发展内卷和结构限制的问题。一方面，“产业趋同”下发展内卷与效益微弱。在乡村产业规模发展过程中，由于相邻村庄的土地条件、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相似，村与村的产业发展容易形成内卷化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条弱块强”下整合乏力与联结松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土地分配从集中变为分散间接导致了社会交往的分散化，并呈

现出生产经营的分散性。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引领，村庄产业发展难以有效解决分散生产与整体经营的矛盾。破解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于探寻适当的产业与组织互嵌机制。

在以产业振兴为引擎助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不仅是提升村庄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是维系乡村社会稳定的驱动因素。实践中发现，以党的组织力和引领力推动产业发展蕴含着党组织适应社会与自我调适的逻辑。党组织如何通过不断优化和调适自身方向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如何破解产业发展内卷化和分散化问题，形成整体性的发展路径？为了探析以上问题，本文以湖北省麻城市Y镇片区联合党委推动产业发展为例，在实地调研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引入政党适应性理论，构建“组织—功能—环境”的分析框架，多维度分析联合党建推动产业发展的实践机制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党建引领产业振兴提供有益启示。

##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面对组织化程度低、自身禀赋不足的村庄的产业发展难题，推动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党组织的关键引领、分层引领而非全面带领<sup>[11]</sup>，这就需要党组织通过“适应性调适”来实现组织引领和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因此，本文引入政党适应性理论，构建组织再造、功能重组和环境适应三维分析框架，以此揭示联合党建推进产业发展的实践机制。

### （一）理论基础：政党适应性理论

对于“政党适应性”的探讨源于20世纪80年代。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sup>[14]</sup>。”“适应性”是测试政治制度化的四大标准之首。亨廷顿认为：“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反之，适应性越差，越刻板，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适应性就是后天获得的组织性。”诺斯<sup>[15]</sup>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允许运用不同的方式来开展试验，其根本动力在于中国的制度结构存在着一种非比寻常的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根源于环境对政党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包括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在内的外部

环境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这些外部环境会对政党组织和政党制度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挑战。组织的功能往往会因为环境的压力而发生改变。组织成立之后，外部环境往往威胁组织的生存，因此这个组织往往会服从外部环境，而逐渐满足新的功能需要<sup>[16]</sup>。政党的适应性体现在内部的结构性和功能性调整，没有强大适应性的政党势必会在环境变化的影响下走向衰落。

结合本土实际，国内学者进一步深化对政党适应性理论的研究，借助政党适应性理论阐释当代中国的治理结构和政党功能发挥。现代化对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使得党组织需要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以适应新时代要求<sup>[17]</sup>。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党政治理结构兼具治理“弹性”和功能机制的复合性，是国家治理优效的产生缘由<sup>[18]</sup>。从实践来看，党政结构在治理上根据社会需要不断调整，在功能机制上又体现出整合和再生产的能力，彰显了共产党在治理社会和自我革新中的适应与调适。环境、价值和组织是考验政党适应能力、影响政党赓续发展的关键变量，对这三大变量“是否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的判断，最终落实于政党的“行为”<sup>[19]</sup>。杨光斌指出，政党在与外部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复杂互动中，其适应性体现在组织内部的结构性适应和功能性调整<sup>[20]</sup>。面对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政党提高自身适应性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提高政党适应性需要具备对外部环境的感知能力和反应能力以及内部组织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政党可以通过针对性的回应策略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同类型挑战，从而提高回应和适应能力<sup>[21]</sup>。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来看，意识形态创新、组织建设与制度变革的有机互动是中国共产党的调适策略<sup>[22]</sup>。在广大农村地区，党的基层组织通过组织调试、功能拓展与自我净化三种途径来适应组织内外的变化，夯实其在农村的执政基础<sup>[23]</sup>。

## (二) 分析框架：基于“组织—功能—环境”的适应性调适分析框架

在以往农村地区普遍侧重“分”而弱化“统”的经营特点下，农户、土地、生产工具等资源都是分散存在的，村庄内部、村与村之间缺乏资源联通<sup>[24]</sup>。因此，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着资源分散、联合

不足的现实难题。在此背景下，乡村产业发展要想实现规模效应便需打破地域范围的限制，强调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基于此，本文在政党适应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组织—功能—环境”的适应性调适分析框架（图1），用以解释在地域限制和合作难以达成的情况下，联合党建何以推动乡村产业规模化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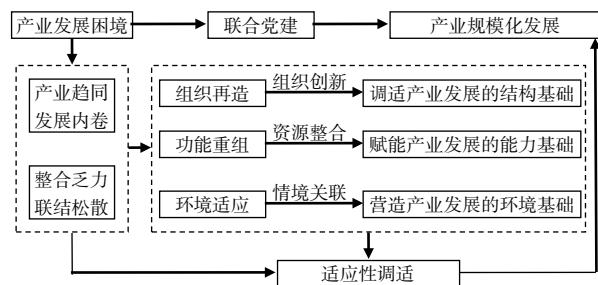


图1 适应性调适分析框架

适应性调适分析框架包括组织再造、功能重组和环境适应三个机制。首先，组织再造。在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组织再造表现为组织方式的创新、组织内容的多元共存，其目标是通过发挥党组织的弹性优势，突破“块块分离”和单打独斗的困境，在一定的范围内将产业发展需要的资源要素重新组织，并建立新的组织机制来调适产业发展的各阶段。其次，功能重组。乡村产业发展关涉内部的利益分配和资源重组，在这一过程中，党组织不仅要发挥组织引领功能，还要在具体的产业实践中突出发展指导功能和利益协调功能。面对不同的治理情景，组织的功能需要不断调适和重组，以符合发展的需要。功能重组是在组织再造的基础上，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发展定位重新调整，从而打破原来的资源网络和关系网络，具体表现为党组织对内的自身定位调适以及对外的治理功能调适。最后，环境适应。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中最重要的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在基层的延伸，同时嵌入农村已有的社会网络之中，是政党体制和乡村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sup>[25]</sup>。产业发展的目标中，党组织不仅要适应乡村社会中复杂的关系网络，还要适应其中的非正式规则。这就要求党组织形成以解决问题和促进发展为导向的环境适应能力，在嵌入乡村产业结构的同时改造现有产业环境。通过组织再造、功能重组和环境适应三个机制的共同作用，产业发展

的结构基础、能力基础和环境基础逐渐优化和完善，从而推进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 三、案例描述：麻城市Y镇产业的发展实践

#### （一）“片区联合党委”的创建背景

集体经济是农民共同富裕的根基，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质保障。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不但可以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还可以发挥调节作用，防止两极分化<sup>[26]</sup>。发展乡村产业是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形式。在产业发展“从无到有”向“从有到优”的转型阶段，需具土地、资源与人力等生产要素的集约化配置，以及健全的合作和资源协调机制。中国乡土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产业发展不得不面对并打破乡土关系的束缚和乡土地域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虽然在改革之初极大地推动了农业农村的发展，但是却在当下造成了“分有余而统不足”的现实境况<sup>[27]</sup>。湖北省麻城市Y镇被称为板栗之乡，但由于未形成集约化、规模化的产业链，售卖板栗多以小农户个人自发为主，板栗买卖的附加价值较少。分散的经营并未形成较大的经济效益，尽管农业生产中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但生产效率并没有提高，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造成了产业发展的内卷<sup>[28]</sup>。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党中央将“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工作重点，乡村产业面临一个多元异质性与区域扩大化的发展环境<sup>[29]</sup>。在这一背景下，产业发展更加强调打破现有的组织和资源结构，以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发展模式的集约化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了激发区域活力、推动产业规模发展，Y镇党委班子成员先后去先进地区考察学习，探寻以“党建+产业”的模式推进产业发展，从而破解制约产业发展的现实难题。

#### （二）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取暖”的产业发展模式

2020年，Y镇党委考察学习先进地区的产业发展模式后，决定成立“片区联合党委”，盘活镇域内的资源。经镇党委商定，按照地域相邻的原则初步将乡镇20个村规划为4个片区。根据各村发展实

际，Y镇党委将Q村、M村、Y村、Z村和X村所在的片区作为第一示范片区。2020年10月，片区联合党委成立，并经由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基层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

其一，Y镇“片区联合党委”在坚持村级行政区域不变、村民自治主体不变、财务管理体制不变和党员组织关系不变等“七不变”的前提下，统一命名为“中国共产党麻城市Y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联合委员会”，并构建了“大党委”工作和服务体系。一方面，建立议事、管理、联系、考评和平台建设五大运行机制。另一方面，通过“组织联建、规划联合、产业联抓、资源联享、活动联办、治理联动”的“六联”模式，统筹片区发展资源，集中办好民生实事，将资金和项目用到最关键的地方。实践中，Q村和Y村通过合作引进乳橘产业，成功流转村庄土地300亩，增加就业岗位100余个。

“我们规划怎么搞，要征求其他几个村的意见。比如涉及修路，道路怎么定线？大家要在一起规划，然后分块实施，这个很必要。针对产业联抓，比如说Y村的橘子种得比较好，种植技术攻破了，其他村可以引进，到时候把范围规模扩大，这样效益就要高一些。乳橘不能说只是某一村的，要把它搞成全镇的。”（20230720ZSM）

其二，“片区联合党委”以地域为依托，通过调整各村产业发展方向，推进功能互补型农旅产业发展模式和集约化农产品经销模式。一方面，为了突出各村文旅产业优势避免恶性竞争，经“片区联合党委”协商讨论和前期调研，将五村文旅产业分别定位为：农旅融合示范区、绿色循环生态示范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和库区移民示范区。另一方面，为了集体经济增长和农产品销售，“片区联合党委”在现有产业资源基础上，主动协调各村，共同发掘市场、合力推销农产品。通过举办红莲节、乳橘节等活动宣传片区文旅资源和农副产品。

“以前每年到了板栗丰收的时候，各村都要自己想办法找市场，有时候难免存在竞争关系。再加上一个村的供应量太小，农产品售卖渠道非常有限。成立联合党委后，很明显大家有一个一起努力的方向，经过镇里协调，愿意劲儿往一块使。我们

还计划几个村商量一下，划一片地出来，建一个板栗加工厂，这样板栗的附加值能进一步提高。”  
(20230718XJP)

其三，Y镇“片区联合党委”建立了片区下辖各党委工作相互通报制度。针对各村实际状况不同、发展能力参差不齐这一现状，片区党委将考核分区分类，进行百分制量化考核，考核结果与“两委班子”工作经费和奖励性工资批复挂钩，激励辖区各村积极谋划、主动作为。在正向激励之下，各村通过招商引资、盘活集体资产等方式，积极推进产业发展。Q村引进农业有限公司，投资100万元发展集红莲观赏采摘、垂钓休闲、生态养殖等于一体的生态观光产业园；Y村采取村社合一模式流转土地200余亩，发展野菊花、蕲艾、芍药等中药材，种植30亩连片水稻；M村引进市场主体盘活集体资产，发展苗圃、香菇和菊花产业；Y村新栽种乳桔20 000余株；Z村发展花椒、油茶基地200余亩。

#### 四、“组织—功能—环境”：“适应性调适”模式的实践机制

“适应性调适”源自政党适应性理论，也是基层党组织面对社会复杂性和多样性做出的自我调整。这一概念强调通过发挥联合党建的调适能力，从而引领乡村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在Y镇的联合党建实践中，通过组织再造、功能重组和环境适应三个机制实现了对产业规模发展需要的结构基础、能力基础和环境基础的调适。一是组织再造调适了产业规模发展的结构基础。基层党组织通过联合党建的方式，打破了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结构。具体来看，联合党建通过构建以发展为导向的组织网络，健全组织内部的合作机制，把党组织的权威性融入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二是功能重组调适了产业规模发展的能力基础。组织的有效性有赖于其内部功能的适应性和科学性。通过对资源配置过程的优化和资源配置目标的调适，原有的资源配置网络被进一步优化，更有利于产业发展和治理目标的双向增能。三是环境适应调适了产业规模发展的环境基础。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政策目标和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适应性调适”从问题导向的适应逻辑和绩效导向的适应逻辑出发，强化了

党组织与产业发展环境的适配性，避免了政策推动过程中因“水土不服”造成的资源耗散。

##### (一) 组织再造：以组织创新调适产业发展的结构基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产业主体必须积极突破原有组织边界，以组织再造获得能力提升所需的动力。联合党建在产业规模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天然的组织优势。首先是党政结构的功能性均衡，即党政结构基于治理需要，有机结合治理柔性和政策刚性，克服了政府科层体系的内生性“刚性”缺陷。这种刚柔并济的组织方式能够减少具体决策中的资源耗散。其次是它有效覆盖了边界分明的科层制所无法解决的跨边界发展难题，有效弥合了政府体系内部的治理“缝隙”<sup>[30]</sup>。联合党建在两方面实现了对产业发展结构的调适。

一是跨越原有组织边界，构建发展为导向的组织网络。当下农村地区的组织网络主要依托地理边界，以解决行政区划内的事务为目标。就产业发展来说，新时代以来随着项目下乡、资源下乡等政策的推动，当前的组织网络和组织方式未能激发最大的产业发展动能。尽管县一级具有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承载力，但在面对跨村的资源配置和产业合作时容易遭遇“水土不服”。“联合党建”超越既有地域范围的人员和组织形式，在发挥功能性组织的优势中调适产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制约因素。首先，新的组织网络基于产业发展的目标产生。在发挥党组织弹性优势并尊重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的基础上，“联合党建”以地域相连为基础、产业相近为依托，通过对标产业发展目标划定组织的空间范围。这种组织网络与产业结构互构的模式不仅将党组织的组织优势最大化，同时也更有利于产业自身的规模发展。其次，重新搭建的组织网络形成了与发展相匹配的治理架构。产业发展的规模化需要依赖强大高效的组织结构，这一治理结构必须兼顾科学性与高效性。科学性是指治理架构需要符合产业规划的空间基础和群众基础，在服务产业发展各个阶段的同时符合以产业带动民生保障的目标，通过组织目标和产业发展相契合，增强组织的适应能力，避免造成治理悬浮。高效性要求组织架构在遵从地方特性的同时以发展为第一目标。“联合党建”

在保证组织人员在地性的同时，将涉及产业发展的各村书记交叉任命为片区联合党委的支委成员，使产业发展的领导结构变为一种村与村的有机联结，既避免了“一言堂”可能导致的决策失误，又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将组织建设、产业发展和干部激励有机融合。

二是完善制度，形成可持续的组织运转机制。从中国乡村的实践来看，政府、市场和集体在乡村资源配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影响资源配置过程的重要因素<sup>[31]</sup>，平衡多方主体、发挥各主体优势是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联合党建”通过目标责任的分解以及适当的考评措施健全组织运转机制，实现多方联动及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首先是以目标责任分解推进项目运作。产业发展需要各主体承担相应的发展任务。案例中，“联合党建”制定整体发展目标后，由市场主体代理产业经营，由各村承担若干子目标的落实。同时，依托项目协商、产业协商和绩效协商，更有利于村庄、党委、企业和市场等主体共同推进产业的发展。这种目标分解制的“党建+产业”模式激活了各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将党组织视为引领者和指导者，而不是层层包揽的执行者，这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持续性和内生性。其次是以全流程考评促进能动性激发。“片区联合党委”作为功能性的组织，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权威性塑造和效能发挥需要依托健全的考评机制。具体来看，考评机制通过将产业发展与村庄考核挂钩、与干部绩效挂钩，不仅有利于塑造片区联合党委的权威性，还有利于激发村庄能动性以及规范市场行为。在目标分解和全流程考评中，各村的产业实践纳入同一目标体系之下，而产业发展的目标实现又通过协商和激励机制落实到更具体微观的村庄层级，从而保障了产业发展中整体和部分的关联。

## （二）功能重组：以资源整合赋能产业发展的能力基础

在当代乡村治理中，资源是决定发展能力和治理能力的关键性要素。随着国家以投入和项目支持等方式提供发展支撑，大量资源进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个“资源网络”<sup>[32]</sup>。“资源网络”在资源调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造成了正式资源的非正

常耗散。一方面，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标准化的资源项目与匮乏的地方自主性之间的张力，导致资源下乡未能充分激发地方的发展积极性。另一方面，资源的代理经营造成合作困境。在乡村社会，资源的获取需要通过行政发包、村庄的关系网络等，项目制分级运作中地方政府在“打包”环节植入自身权力、意志，容易侵蚀村庄自主性<sup>[33]</sup>，并不利于村与村的合作与发展。这些困境使得当下的乡村产业发展面对着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导致的能力不足问题。功能重组旨在打破现有的资源网络和关系网络，将资源配置与发展目标同步。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资源配置过程的优化；二是资源配置目标的重置。

在当下的乡村产业发展中，资源配置过程的优化包括配置性资源的优化和权威性资源的吸纳。吉登斯认为，配置性资源表现为各种物质产品，如生产工具、自然资源等；权威性资源则表现为各种社会关系，如血缘关系、宗教传统等<sup>[34]</sup>。从配置性资源的重新优化来看，乡村社会中，配置性资源不仅包括村庄内部的土地等自然资源，还包括来自国家的项目和政策等等。这些在地化和标准化的资源要想实现发展增能，必须依赖组织对资源的协调配置能力。“联合党建”通过统合的思维，在纵向和横向改变了配置性资源的分配。一方面在资源纵向到底的输入过程中，通过兼顾地方发展战略和不同需求，能够避免出现配置不均和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在横向的资源配置过程中，“联合党建”依托协商机制使各主体达成片区利益大于村级利益的共识，从而将土地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服从于整体产业发展，破解了因“属地发展责任”造成的配置难题。能力的运作必须以各种形态的资源为基础，资源是治理活动中的常规性要素和治理行为互动的媒介<sup>[35]</sup>。通过对纵向的资源输入过程干预和横向的资源分配干预，产业发展需要的资源被精准供给，进一步夯实了能力基础。

从权威性资源的吸纳来看，它主要包括对以上级政府为代表的行政性资源和以市场主体为代表的专业性资源的吸纳。产业发展是一项面向市场、群众、政府等多主体的复杂工程，上级政府的注意力作为一种稀缺性权威资源，能够以政府威信力为担保助力产业发展。而市场主体的嵌入，能够让产

业发展更快融入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联合党建”作为一种基层党建的创新形式，本身具有吸引上级组织注意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进一步转化为上级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政策投入和资金投入。同时，党组织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又进一步吸纳市场主体和经营大户的投资。

功能重组不仅要关注资源配置过程，还需要确保资源配置目标与发展目标匹配。相较于科层制，中国共产党更为重视行动路线本身的设计和推进<sup>[36]</sup>，其行为逻辑体现为发展与治理的有机结合。与企业和市场的盈利逻辑不同，“联合党建”表现出的行动逻辑是增加收益与有效治理的双重目标，即以产业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一方面，“片区联合党委”作为功能性党组织能够将党组织的组织力、行动力落实到具体的产业发展中，从而规避市场的营利属性，将产业发展与群众利益相结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优。另一方面，通过健全“联合党建”内部的治理联动机制，能够将产业发展与村庄治理结合起来。在制订“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推动产业联抓治理联动”的行动目标中，将党的组织优势与村庄治理深度契合，在发展产业中推进各村突发事件联动响应、治理任务联合完成。

### （三）环境适应：以情境关联营造产业发展的环境基础

乡村产业发展不仅要完善组织结构和重塑功能，还要关照产业发展所处的客观环境。在双层经营体制的结构影响下，乡村环境中复杂的关系网络和条块分明的科层组织决定了产业发展模式不能完全按照自由市场原则。而党组织形成的治理结构能够以特定治理事项为中心，将任务及其配套资源精准靶向至特定的层级，从而提升执行效率<sup>[37]</sup>。“联合党建”建立的党组织通过形成问题为导向和绩效为导向的环境适应逻辑促进党组织目标与产业环境的深度耦合。

问题为导向的环境适应逻辑主要针对当下基层社会发生的变化，强调组织在复杂的治理情景中提高适应能力。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以及资源要素的快速流动，传统的治理方式和产业发展模式不能完全解决当下出现的难题，这就要求在产业重组

或产业更新阶段更加注重对环境的感知能力。在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产业引领者需要认清发展环境并精准找到依托于特定环境下的发展重点，形成科学的决策和任务分解。在Y镇，革命红色老区是发展文旅产业的底色，一定基础的板栗、红莲等产业是先发基础，同质化严重、经营分散是面对的主要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片区联合党委”通过依托已有基础并逐渐调整发展战略，将“一村一品”的分散优势转化为“产业示范片区”的联合优势，在“认识环境—利用环境—改变环境”中实现环境和发展目标的结合。

以绩效为导向的环境适应逻辑注重通过优化资源环境和顺应制度环境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市场和企业往往因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联合党建能够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优为导向做出相应的发展策略。从实践来看，绩效导向的环境适应逻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优化已有资源环境提高经济效益。片区联合党委在面对雄厚的产业发展基础和分散的产业经营模式之间的张力时，通过土地整合、项目整合和资源整合将客观环境形成的资源结构转化为实现经济效益需要的有利条件。二是通过顺应现有制度环境实现社会效益。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引擎，这就要求产业发展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科层制主要以权威基础上的“命令—服从”为主要方式推动政策目标的落地，这种方式在跨域产业发展上并不能产生最大的绩效。而乡村地区的治理网络主要以地缘血缘为基础，这一组织模式在稳定社会基础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面对以流动性和契约性为特点的市场环境时难以适应。“片区联合党委”通过把村庄党组织的人员纳入新的片区组织架构，并将单个村庄的发展与片区治理目标融合，使得新的组织与已有制度环境高度一致。在具体实践中，片区产业发展的具体决策与农户就业、乡村治理能力以及片区联动能力等事务关联，从而确保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挂钩。

## 五、结论与启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的重要方

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随着农民个体意识的唤醒以及土地的分散化经营，乡村社会进入一个原子化发展的阶段。这种独立经营、分散经营的现状并不利于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本文结合政党适应性理论建立了“组织-功能-环境”的分析框架，通过考察湖北省麻城市Y镇“片区联合党委”助推下的乡村产业发现，片区党组织通过跨边界的组织创新、过程-目标导向的资源整合以及问题-绩效导向的情景关联，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一“适应性调适”是新时代党组织引领产业发展的具体方式，不仅创新了党组织的组织路径，而且助推了乡村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本研究有助于从两方面与政党适应性理论对话。一是将政党适应性理论引入更加微观的基层组织场域，有助于理解在党政体制之下，党组织如何在面对基层社会的复杂情形下做出适应性调整。二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揭示了政党适应性的底层逻辑，即通过组织、行动和功能的多元重塑，实现政党与社会的双向互嵌和共同成长。

本文的研究还为其他地区深入推进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首先，要破除不适于党组织与产业发展主体互相增能、互动共治的结构因素。正如Y镇经验所揭示的：要以“产业一盘棋”的全局思维打破地域限制、整合资源，盘活产业发展的地域活力，改变产业发展中产业细碎化和分散化的格局，营造相对弹性的产业发展环境。同时，还要加强党组织成员和产业能人的联系，以党建促产业，为产业发展提供稳固的组织基础。其次，要开展有利于党组织和产业发展有机契合的行动过程。从Y镇的实践来看，行动过程的规划最终指向巩固和优化已有的产业结构。要加强对产业发展中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重组和再配置，在过程导向和目标导向中优化产业发展中各主体的行动，确保市场主体、村集体、村民等主体在党组织的协调引领中找到集体行动的最优解。最后，要从结构与过程的双向互构中制定相关政策。就本质来看，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结构和行动不断调适和适应的过程，这其中，结构对环境的适应性以及行动与结构的兼容性成为一大张力，这需要党组织、基层政府以及产业发展的责任主体在政策

制定和具体实施过程中，统筹兼顾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从辩证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产业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 望超凡. 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 28-36.
- [2] 郑永君, 钟楚原, 罗剑朝. 地权整合性、经营嵌入性与乡村产业振兴[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3): 25-43.
- [3] 吴光芸, 周芷馨. 双向增权：数字平台何以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基于D县“T号”运行机制的研究[J]. 电子政务, 2024(9): 102-113.
- [4] 田野, 刘勤, 黄进.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理——基于湖北省秭归县三个典型乡镇的案例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12): 36-46.
- [5] 孙翊铭, 牛喜霞. 供销合作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内在机理、实践探索与思考建议[J]. 农村经济, 2024(6): 57-65.
- [6] 杨宝强, 钟曼丽. 从外包到内生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长效路径研究[J]. 理论月刊, 2023(3): 99-107.
- [7] 贺林波, 李甜.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政企合作及其社会基础——以湖南省B县黄金茶产业开发为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99-115.
- [8] 周力, 刘宗志, 沈坤荣. “万企帮万村”的引资与农户增收效应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25(2): 110-130.
- [9] 杨晓婷, 倪国华. 党的组织力何以助推乡村共同富裕？——基于“情景-主体-策略-制度”的解释框架[J]. 学习与实践, 2024(7): 39-49.
- [10] 高雪莲. 党建引领为基础的互构式农业组织化研究——张掖市柳新区党组织助力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案例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 34-42.
- [11] 张雨薇. 党建引领产业振兴：分层治理视野下农村集体经济经济发展研究[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3(6): 66-75.
- [12] 杜志雄, 赵黎, 崔红志. 跨村联建、村企共建：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与发展的实践探索[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2(1): 95-103.
- [13] 吴彬, 徐旭初, 徐菁. 跨边界发展网络：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逻辑——基于甘肃省临洮县的案例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12): 59-72.
- [14]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1.
- [15] DOUGLASS C N.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4.
- [16] 斯科特.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利益偏好与身份认

- 同[M]. 姚伟,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168.
- [17] 唐皇凤. 使命型政党: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基础[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37-47.
- [18] 王浦劬, 汤彬. 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9): 4-24, 204.
- [19] 曹文宏, 黄智春. “大党独有难题”的生成机理与纾解之道——基于“政党适应性”理论的分析框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4(6): 5-12.
- [20] 杨光斌. 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 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20.
- [21] 景跃进. 转型、吸纳和渗透——挑战环境下执政党组织技术的嬗变及其问题[J]. 中国非营利评论, 2011, 7(1): 30-54.
- [22] 唐皇凤. 增强执政党调适性: 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战略取向[J]. 浙江社会科学, 2013(2): 4-11, 156.
- [23] 孙乔婧, 金燕. 政党适应性: 组织调适、功能拓展与自我净化——以新时期农村党组织建设为视阈[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7(2): 40-47.
- [24] 李忠鹏, 王伟. 基层党组织领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生成逻辑、作用机制与优化路径[J]. 农村经济, 2024(4): 1-12.
- [25] 杨正喜. 基层党组织适应性: 党建引领嵌入乡村治理逻辑分析[J]. 社会科学家, 2022(1): 101-107.
- [26] 习近平. 摆脱贫困[M]. 福建: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 193.
- [27] 毛铖. 利益缔结与统分结合: 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统分两极化向统分结合的理性与回归性演变[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6): 81-86.
- [28] 陈文琼. 悬浮型农村与基层治理断裂带——对农民主体缺位和基层治理内卷的再解读[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9): 145-153.
- [29] 曾薇. 在地化调适: 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创新[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6): 103-123.
- [30] 叶敏. 政党组织社会: 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之道[J]. 探索, 2018(4): 117-122.
- [31] 徐亚东, 邹宝玲, 张禹书, 等. 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多案例验证——基于“有为政府-有能集体-有效市场”理论框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5(7): 92-109.
- [32] 黄杰, 吴文旭. 权力的资源网络: 当代国家能力与乡村治理绩效——基于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H村的考察[J]. 求实, 2025(1): 91-108, 112.
- [33] 折晓叶, 陈婴婴. 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4): 126-148, 223.
- [34] 张俊伟, 王新建. 基层治理能力视域下资源下沉的效力局限与路径构建[J]. 东岳论丛, 2022(12): 151-156.
- [35] 于水, 辛境怡.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的建构基础与生产机制[J]. 学习与实践, 2020(12): 21-30.
- [36] 张康之. 论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 从制度到行动[J]. 探索, 2019(3): 113-121.
- [37] 折晓叶. 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1): 121-139, 207.

责任编辑: 黄燕妮